



CRPE  
CENTER FOR RESEARCH IN PRIVATE ECONOMY, ZHEJIANG UNIVERSITY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Reports on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Marine Economy  
and Marinepower Construction

# 海洋经济发展报告

——海洋经济与海洋强国建设国际研讨会文集

史晋川 王志凯 主编

Edited by Jinchuan Shi and Zhikai Wang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Reports on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Marine Economy  
and Marinepower Construction

# 海洋经济发展报告

——海洋经济与海洋强国建设国际研讨会文集

史晋川 王志凯 主编

Edited by Jinchuan Shi and Zhikai Wang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洋经济发展报告:海洋经济与海洋强国建设国际研讨会文集 / 史晋川,王志凯主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4

ISBN 978-7-308-12873-5

I. ①海… II. ①史… ②王… III. ①海洋经济—经济发展—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P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9712 号

## 海洋经济发展报告

史晋川 王志凯 主编

---

责任编辑 傅百荣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27

字 数 838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873-5

定 价 7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海洋渔业资源恢复工程研究”（项目编号：71373234）资助

# 前言

## Introduction

随着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实施,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建设规划在 2011 年相继获得国务院批准。浙江大学面向国家海洋发展战略这一重大发展战略需求,迅速投入海洋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2011 年底,学校专门组建由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史晋川教授领衔的文科海洋交叉项目课题组,课题组下共设海洋文化传媒、海洋经济管理、海洋资源环境和海洋法律政治四个研究方向,由学校“985 项目”专款资助开展研究。不久前召开的“海洋经济与海洋强国建设国际研讨会”,就是文科海洋交叉项目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会议安排,目的是为了汇集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探讨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强国建设之路,促进中国海洋经济持续和健康发展。

“海洋经济与海洋强国建设国际研讨会”于 2013 年 5 月 13—15 日在杭州金溪山庄召开,会议由浙江大学主办,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和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承办,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史晋川教授和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余逊达教授担任会议主席,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志凯担任会议秘书长。参加这次国际研讨会的代表,有来自挪威卑尔根大学、特隆姆索大学,西班牙圣地亚哥联合大学,德国巴登—符登堡合作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韩国釜山釜庆大学、新罗大学,台湾金门大学,浙江大学、宁波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暨南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大学、江苏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也有来自国家海洋局、国家海洋局信息中心、浙江省海洋渔业局、浙江省发改委等政府部门的代表。会议收到有关海洋经济理论研究、海洋发展政策研究、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等方面的论文共 40 余篇。本书即由这次国际会议的报告和论文集辑出版。

本书第一部分由会议的主题报告组成,主要包括国际海产品贸易、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港口港航规划战略与建设、海洋战略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研究内容。

挪威的 Knut Bjorn Lindkvist 教授发表了“国际海产品贸易中的传统价值习俗与价值链关系研究”(Conventions and value-chains in international seafood trade)的主题报告。在 Lindkvist 教授的文章中,他以挪威腌鱼在西班牙市场的兴衰为例,说明了海产品生产加工应该适应消费市场新的变化而相应调整的事实。这对中国海产品加工,以及对中国海产品占领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直接的启示。

西班牙的 Ruben Camilo Lois Gonzalez 教授与其合作者 Maria Angeles Pineiro Antelo 的报告,研究的是“捕捞行为与可持续的渔业增长模式”问题。他在文章中解读了捕捞方式与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给我们展示了西班牙由曾经的过度捕捞和海洋渔业资源枯竭,转变到现

在的适度捕捞和养殖结合,大量沿海渔民转产转业从事海洋旅游和娱乐业,支持了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渔村、渔民安居乐业景象。西班牙海洋渔业和沿海渔民经历的从资源枯竭到资源恢复的发展过程,对中国沿海时下面临的渔业资源枯竭问题的应对和解决,具有很好的启发。

德国的 Harald Nitsch 教授其演讲题目是“德国的港口竞争观察”,他在其文章中提出了港口港航发展在海洋发展战略中应该实施协同整合的方案,不宜到处都无序竞争新上港航项目。即使一个地方发现有深水岸线,可以建设优良海港,也要考虑这个区域与周边特别是内陆市场及生产地的交通联络状况,有无水路、陆路与内陆的联系,论证其能否起到港口港航服务内陆的作用;要新建一个海港,还要考虑到新建海港与其他海港在未来的分工协作及竞争关系,考虑现在的投入与未来的经济、市场及社会的收益;等等。基于这样的分析,Nitsch 教授运用德国港口港航建设发展的案例,说明在海洋经济发展战略中,开发建设新的港口港航项目,往往不如挖掘既有港口港航的吞吐能力和巩固其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来得更具效率。

韩国的 Jong-Hwan Ko 教授演讲题目是“中国海洋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Ko 教授在其文章中,运用 CGE 模型分析方法初步预测海洋战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从贸易、税收、能源和环境政策等方面定量研究,并且将中国海洋战略对经济增长的可能效应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研究,初步展现了一幅鼓舞人心的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前景。

大会主题演讲报告的安排非常重视海洋渔业发展问题。海洋渔业是与海洋、沿海岸线保护开发紧密相连,与渔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海洋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发展海洋新兴产业诸如海洋生物、海洋医药,还是船舶制造等海洋产业,都必须十分重视渔民赖以生存之本——海洋渔业。在这方面,西班牙与韩国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供学习借鉴,利用沿海既有的自然资源,拓宽产业发展链,大力开发沿海渔村的海洋文化群落,发展海洋旅游业和海洋娱乐业,让渔民能够参与其中,在发展海洋旅游和娱乐业中实现安居乐业。

本书第二部分是英文报告为主的专题报告,内容包括了海产品市场的新型速冻技术与解冻技术、中国海产品消费需求变动趋势、南中国海渔业生态保护与管理、沿海湿地保护与开发、全球物联网发展和物流业创新绩效、港口定价与估价方法、深蓝经济发展、海洋产业与海洋生态耦合、海上原油泄漏生态补偿的法律问题等等。

挪威的 Torbjorn Trondsen 教授的文章是研究“新鲜冷冻和新鲜优质海产品的市场配置问题”,他给我们展示了一种海产品新鲜速冻和新型解冻技术,这种速冻和解冻技术能够使海产品解冻后质量保持与其鲜活状态的质量基本一致。这种在海产品储存和运输中可以广为使用的技术创新,给大家展现了一个延长海产品的市场配置空间和市场配置时间的美好愿景,也给渔民和海产品营销商带来了更大的福音。

中国海洋大学高金田教授与其同事的文章,研究的是中国海产品消费需求的变动态势与影响因素。他们的研究显示:影响海产品消费需求的因素主要有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化水平、地区人口规模和海产品的市场价格。他们预测在 2011 年到 2015 年之间,中国的海产品消费需求会缓慢增长,大概全国会增加约 300 万吨海产品的消费,东部沿海地区居民的海产品消费的刚性增加更强一些,西部地区民众的海产品消费受到收入的影响会更大。

暨南大学的陈明宝博士做了“南中国海渔业资源的生态保护与管理研究”的报告,分析了南中国海渔业生态管理与保护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加强南中国海渔业资源的生态保护与管理的政策建议。

韩国釜山釜庆大学的 Heedong Pyo 教授的论文标题是“沿海湿地保护与开发的经济分析”。他运用经典的收益—成本分析方法,研究沿海湿地转为农业开发用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经济成本问题。他以韩国光州甬山河谷湿地的保护与农业开发作为案例,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得出结论:如果仅是农业开发而不包括将湿地围栏后转换为工业用地,那么湿地的农业开发是远比湿地保护来得低效。Pyo 教授的研究结论提醒我们在沿海湿地的保护与开发上,一定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权衡开发与保护的得失利弊。

韩国的 Seo Changbae 教授和 Kim Hyunggeun 教授、Hong Jin Young 教授的论文是“中国全球供应网络变化和物联网发展对釜山港再开发的影响研究”。他们分析了中国沿海港口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互联网服务体系发展,研究中国沿海港口这种新的发展对韩国港口的影响。他们以釜山港为例,研究了釜山港和韩国其他港口在东北亚物联网的发展中,如何应对挑战并抓住机遇。针对中国港航参与国际物联网的情境,他们提出了一些提升釜山港功能的建议:集中加大企业对港口自由贸易区的运用,与中国的港口之间建立市场关联协作关系,增强韩国船运公司在其他国家的服务网络建设,实现港航物流附加价值最大化。

上海海事大学的瞿群臻教授的文章是“海洋物流产业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绩效评价”,她运用层次分析方法,确定不同绩效指标的权重,将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她的结论是:政府应该为海洋物流企业提供补贴以帮助企业进行人才培养,鼓励员工努力工作创造最好的工作业绩,加强员工间的沟通和交流以提升工作绩效。

浙江大学的冯友建博士与他的同事合作的论文是“港口定价估价法分析”。冯博士在文中介绍了港口定价的含义,对港口定价的技术路径和评价原则进行了研究和界定,提出收入分析法是重要的港口定价估价方法,另外不同区域的港口定价比较则是收入分析方法的一个重要补充。

中国海洋大学的李京梅教授和许玲博士的论文,讲的是海洋产业结构与海洋生态经济耦合协调问题。她们运用青岛的蓝色海洋经济区作为分析案例,运用海洋产业与海洋生态协调度和库兹涅茨环境曲线,揭示海洋产业结构与海洋环境之间的耦合效应,并指出现在青岛的海洋产业与海洋生态之间的耦合只是处于一个低级阶段,需要通过海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来改善海洋生态。

暨南大学的陈明宝和他的同事也做了一篇“深蓝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的文章,他们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分析研究了影响深蓝经济发展的因素,提出整体考虑各种因素对发展深蓝经济的影响,以便全面布局深蓝经济发展战略。

韩国的 Suk-Ho Jung 教授和 Dae-Kwon Koh 教授的文章是关于海事组织监管对海洋柴油发动机技术发展的影响。由于国际海事组织监管对柴油发动机排放的标准提高,迫使国际运输船舶的柴油发动机技术不断革新,以降低排放,提高海洋运输设备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这对船舶制造业和海洋运输业都带来了一些影响。

中国海洋大学梅宏博士的论文聚焦于海上原油泄漏应急处置问题,论文标题是“执行联合国 UNCLOS 的 43 条:以马六甲海峡原油泄漏应急处置合作机制为案例的解析”。他以马六甲海峡原油泄漏处置作为案例分析,提出了完善联合国 UNCLOS 的 43 条款的建议。

上海对外贸易大学刘丹博士的论文是“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生态破坏补偿立法状况”。她从 2011 年发生在中国渤海的石油泄漏事故出发,研究中国海洋生态破坏补偿的立法问题,提出中国亟需加强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工作。

台湾金门大学的俞剑鸿教授的论文,从国学角度阐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保护海洋领海主权的潜在意识和强大决心。

本书第三部分是以中文报告为主的专题报告,内容囊括了世界港口气候行动与绿色港航



物流发展、港口后勤区域演化、亚太知识经济发展格局、海岛旅游度假区规划创新、海洋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测度研究、海洋渔业资源恢复与保护、海洋岸线保护的红线制度、海洋政治与海洋法律、海洋文化与海洋意识等等。

宁波大学商学院院长钟昌标教授的文章是“世界港口气候行动与绿色港航物流发展战略”，提出港口气候行动的自愿化原则和有限强制性原则结合的绿色港航发展思路。

复旦大学的马忠法博士的论文聚焦于中国海洋开发法律制度的完善，他认为中国提高海洋开发能力建设海洋强国，需要相应法律制度的保障，包括构建海洋开发法律制度，制定海洋基本法。

广东海洋大学的张建刚副教授的论文是“中国海洋政治战略的思考方法”，提出中国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要把“被遏制”作为一种动力，以合作的方式实现中国的海洋经济空间，并保护中国的海洋主权。

辽宁师范大学的李悦铮教授与其同事的合作论文是“海岛旅游度假区建设规划创新研究”。他们以大连长山群岛国际旅游度假区规划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提出海岛旅游度假区规划的理念创新、体制创新、任务创新、模式创新。

广东海洋大学白福臣教授的论文是关于“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协调发展的测度研究”。他构建了一个评价海洋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与模型，运用模型对中国海洋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其结论是中国海洋环境发展一直滞后于海洋经济，2008年以后海洋环境发展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必须引起政府与社会、企业的高度重视。

上海交通大学罗守贵教授的论文是“亚太知识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他通过对亚太33个地区运用19个知识经济指标进行综合评估，确立了亚太知识竞争力指数及排名，结果发现亚太地区的三类经济体——日本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四小龙”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兴经济体、中国大陆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兴经济体，因为各自生产方式的变化，正在酝酿新的格局。其对中国的启示是：中国过去依靠传统生产方式急起直追，现在和未来，则必须建立起知识经济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超越。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曹有挥研究员与其同事的合作论文是“港口后勤区域形成演化机理”。他们以上海港为例，归纳了港口后勤区域演化的四个阶段，即初步发育、非均衡拓展、非均衡快速扩张和高度分化四个阶段，揭示出全球供应链发展与港口功能演化的关系。

浙江大学的王志凯与史晋川教授合作的论文是“中国海洋渔业资源恢复与保护研究”。他们结合浙江沿海渔业资源枯竭的严峻事实，从加大渔民转产、转业力度，严控沿海工业对海域的污染，系统实施海洋渔业人工养殖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海洋渔业资源恢复与保护的可能途径。

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王芳研究员的论文是“抓住机遇，建设‘强而不霸’的新型海洋强国”。她提出中国的海洋战略要遵循和平发展的方针，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要坚决维护海洋主权，建设和谐的海洋国际环境。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赵鹏与其同事的合作论文是“我国自然岸线开发现状和实行海岸红线制度的思考”。他们在分析了中国自然岸线开发利用现状后，建议中国实施包括自然岸线保护红线、区域开发控制、交易制度、缓冲区制度、人工岸线高效利用和整治修复等内容在内的海岸红线制度。

同样是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孙瑞杰，他的论文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和趋势研究”。文章分析中国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推测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得出中国海洋产业结



构逐渐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的结论。

浙江大学马潮和张程红合作的论文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他们在对国内外发展海洋经济的金融支持模式及策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浙江发展海洋经济的金融需求,从融资性支持、风险性控制以及辅助性金融支持三个方面,对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提出了有益的政策建议。

上海海事大学的徐从江和瞿群臻合作的论文“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他们运用 SWOT 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劣势以及所面临的机遇、挑战进行了论证,结合中国主要海洋经济区海洋文化产业的实践,提出基于区域间协同发展的雁阵模式与基于产业间协同集群模式相结合的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海洋大学陈晔博士的论文是“上海开埠和现代上海居民的海洋观念变化”。他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给大家讲述了上海居民或中国居民由先前的畏惧害怕海洋,到后来的逐渐认识海洋并试图控制改造海洋,这样的海洋态度和观念变化,强调这种变化与上海的开埠进程是相关的。

广东海洋大学任念文博士的论文,“明朝时中国南海的朝贡制和国家的区域海洋战略”,也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的一个研究。中国明朝时在南海地区实行的朝贡制,实际上维系了南海周边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共处,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明朝南海周边的朝贡制是现代国际海洋法的雏形,这有利于国际社会理解中国明朝的南海朝贡制,对于西方和世界认同中国今天的海洋战略是有帮助的。

需要指出的是,会议期间,正值浙江面对今年春汛东海无鱼可捕的窘境。确实,中国海洋渔业枯竭问题不是这一、两年的事,而是多年来捕捞过度,加上沿海工业化造成近海海域的污染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浙江来看,突出的问题在于过度强大的捕捞能力与日益衰竭的海洋渔业资源之间的矛盾尖锐性。这个问题也给中国的海洋经济战略带来严峻的挑战,自然也成为国际研讨会讨论的焦点。浙江一直致力于发展海洋经济、海洋船舶制造、海洋建筑业、海洋新兴产业……作为海洋经济的主体,这些词语因为经常被提起而变得越来越热门。但发展海洋经济还是要从传统产业,也就是从保护和恢复海洋渔业资源做起,海洋渔业是与沿海、岸线和渔民密切相关的,渔业类似于陆地上的农业,是沿海居民的生存之本。

本书除大会报告论文外,还选登了部分大会书面交流论文,内容涵盖了海洋经济的其他一些相关领域的问题。这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的出版,是浙江大学海洋学科建设与服务海洋经济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的展现,为浙江大学在海洋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加强与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史晋川、王志凯  
2013年9月20日

# 目 录

前言(Introduction)	(1)
------------------	-----

## 第一部分 主题报告(The First Part: Opening Session Presentations)

Chapter 1. Value-chains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a European fishing industry	Knut Bjorn Lindkvist(3)
Chapter 2. The fishing activities and the model of sustainable fishing in Spain	Rubén C. Lois González and María Ángeles Piñeiro Antelo(24)
Chapter 3. Sea harbor competition: a German perspective	Harald Nitsch(37)
Chapter 4. A study of effects of marine development plan on the Chinese economy: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Jong-Hwan Ko(54)

## 第二部分 英文专题报告(The Second Part: Presentations in English)

Chapter 5. Coolnova® fresh from frozen, seafood just-in-time year around!	Torbjørn Trondsen(75)
Chapter 6. China's aquatic products consumption demand tendency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analysis	Jintian Gao, Jingmei Li, Tieying Liu(86)
Chapter 7.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fishery resources ecosystem- bas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Mingbao Chen(120)
Chapter 8.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preservation versus development of coastal wetlands around the Youngsan River	Heedong Pyo(132)
Chapter 9. A study on the changing of Chinese global supply network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tribution industry: Focused on revitalizing Busan Port	Hyunggeun Kim, Changbae Seo, Jinyoung Hong (152)
Chapter 10.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search of marine logistics industry i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Qunzhen Qu, Yanjun Liu(171)
Chapter 11. Research of the appraisal methods of seaport criteria price: a case of Xiangshan	Youjian Feng, Junwen Lu, Jing Wang(182)

Chapter 12. Study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structure of marine industry and marine eco-environment: a case study of Qingdao Blue Economy Zone .....	Jingmei Li, Ling Xu (194)
Chapter 13. Analysis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China deep-sea economic development .....	Mingbao Chen, Limin Han (205)
Chapter 14. Technologies for IMO regulations (Tier II and III) on marine diesel engine .....	Jung Sukho, Koh Daekwon (216)
Chapter 15. On perfecting article 43 of UNCLOS —Taking the oil spill emergency response cooperative mechanism for the strait of malacca as an Illustration .....	Mei Hong (221)
Chapter 16. Revisiting the Chinese legislation on compensation for marine ecological damages: lesson learned from 2011 Bohai oil spill .....	Dan Liu (236)
Chapter 17. In defense of the U-shaped line: using the Chinese ideogram, 國, for the Explication .....	Yu Peter Kien-hong (252)

### 第三部分 中文专题报告 (The Third Part: Presentations in Chinese)

第 18 章 面向世界港口气候行动的港航物流绿色服务体系建设 .....	钟昌标 董楠楠 (271)
第 19 章 论我国海洋开发法律制度的完善 .....	马忠法 (277)
第 20 章 中国海洋政治战略的思考 .....	张建刚 (292)
第 21 章 海岛旅游度假区规划创新研究 ——以大连长山群岛为例 .....	李悦铮 俞金国 王恒等 (300)
第 22 章 我国海洋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测度研究 .....	白福臣 (310)
第 23 章 亚太地区知识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基于知识竞争力的评价 .....	罗守贵 (316)
第 24 章 港口后勤区域形成演化机理 ——以上海港为例 .....	曹有挥 梁双波 (326)
第 25 章 中国海洋渔业资源恢复与保护问题研究 .....	王志凯 史晋川 (341)
第 26 章 抓住机遇,建设“强而不霸”的新型海洋强国 .....	王 芳 (351)
第 27 章 我国自然岸线开发现状和实行海岸红线制度的思考 .....	赵 鹏 李双建 杨 潇 (358)
第 28 章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和趋势研究 .....	孙瑞杰 (366)
第 29 章 海洋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	马 潮 张程红 (374)
第 30 章 长三角区域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 .....	徐从江 瞿群臻 (382)
第 31 章 近代上海居民海洋观念的转变 .....	陈 晔 (392)
第 32 章 明初南海朝贡制度与国家海洋战略 .....	任念文 (400)
第 33 章 海洋旅游发展路径研究:以浙江为例 .....	陈劲鸿 柯毅强 (412)
致谢 .....	(421)

  
海洋经济发展报告  
Reports on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第一部分

# 主题报告

The First Part: Opening Session Presentations



## Chapter 1.

# Value-chains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a European fishing industry<sup>①</sup>

Knut Bjorn Lindkvist

University of Bergen & Finnmark University College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odern Norwegian-Spanish salted fish trade. Using a conceptual approach, we adopt a socio-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seafood trade that emphasizes the themes of value chains, food conventions, and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The discussion concerns the implications of governance structures for the adaptation of conventions across units of the value chain. The formal conventions of the Norwegian component of the value chain, combined with its fragmented structure, prevent adaptive development by local Norwegian producers for the contemporary Spanish salted fish product market. Instead, Norwegian producers retain their place with traditional products in established but less influential value chains.

**Key words:** Value chain;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convention theory; seafood trade; Spanish markets

## I . Introduction and scope of the article

Norwegian producers have experienced a substantial reduction in their share of the Spanish salted fish market, falling from nearly 40 percent to approximately 10 percent during the 1990s. One would expect the Norwegian industry to have recaptured its lost market share, but it has not.

One possible reason is that the demands and product structure of Spanish fish markets have changed over recent decades (Lindkvist, Gallart-Jornet & Stabell, 2008). The Spanish markets that have emerged since the 1990s now demand white, thick, juicy fish that the Norwegian salted fish industry has been unable to deliver. Normally, one of two methods would have allowed producers such as those in Norway to meet new product demand. First, a careful production process, following all the rules (or conventions) of production to the

---

① Research Council of Norway, project number 185126/I10



letter, could have enabled producers to achieve good-quality results and avoid the potential traps associa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rocessing of fish resources. Second, producers could have chosen an even more efficient solution and injected phosphates into the brine used to salt the fish. Overall, phosphates give the fish a whiter colour because the fish fat is not oxidized, and as they bind water to the fish meat molecules, they help retain its juiciness.

A possible hypothesis that may explain the Norwegian lack of success in Spain is that Norwegian production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institutions, especially the relevant Norwegian market and production conventions, are designed for markets other than the Spanish consumer market.

Why then were the Norwegians hesitant or reluctant to make the necessary changes to adapt to product and production conventions initiated in Spain?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wo closely related expectations. First, the existence of traditional markets, both in Spain and elsewhere, encourages the maintenance of existing practices. Seco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the rules that dominate the Norwegian production environment are either antagonistic towards change or unable to change.

The reason for this observed path dependence is tardiness in establishing new institutions correspon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on chains. In turn, this at least partly results from a lack of contact with actors in value chains and their direct integration into market units. Thus, if a producer does not want or is simply unable to comply with the new conventions and installations of value chains, it might instead choose to participate in a well-known chain that remains in the original market and to support conventional production and product conventions. The implications for Norwegian producers would still then be acceptable with reference to their total production and local resource acquisition.

The analytical concepts used in this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s in Norwegian-Spanish relations in the salted fish trade are first from the value chain model, and second from the ongoing discourse about conventions in the food industry. The contribution of our work to the debate on conventions linked to the value chain is to show the importance of spatial and functional localization for participants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onventions and product adaptation throughout the value chain.

The remainder of the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The first section that follows discusses the roles that value chain organization and governance play for Norwegian producers and their production strategies in general. The second section examines in detail the model of value chain and its links to various food conventions and the way in which the spatial factor influences value chain operation and the conventions concerned. The third section is on methodology; the fourth section is a discussion of the Norwegian-Spanish value chain in salted fish. The fifth section examines the exchange processes at play in this market, whilst the sixth section introduces the producers' perceptions of the conventions and strategies employed. The seventh section examines some of the obstacles to these developments in consumer markets, and concluding remarks are presented in the final section.

## II .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chain

The analytical tool for our analysis of the lack of market adaptation by the Norwegian salted fish industry depends upon the concept of the value chain and conventions linked to food trade.

The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a value chain (Dicken, 1998; Edgington & Hayter, 1997) focuses on a number of linked transactions, whereby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each subsequent link or production station of the chain increases the value of the goods and services, and where the buyer pays for the value adde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o the flow of goods. According to Dicken (1998: 6), these transactions and processes unfold in a context of technology and R&D as well as processe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ose governing the transportation of materials, goods, and people. The production processes involved also require recognition in an even wider context where in the frameworks comprise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regulatory regime.

A further social extension of this observation is that the behaviour of actors in the value chain draws on the business experiences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production systems that dominate each station in the chain. These experiences accrue when actors conduct business, using their investment in machinery and human resources to manage transactions using various resources to link production and markets.

When Ponte (2009: 236) used the value chain model in his analysis of the South African wine trade with Great Britain, he stated that the “input supply, production, trade and consumption or disposal are explicitly and (at least to some extent) coherently linked” in the value chain. In a similar manner, these references to production and trade are also useful for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fisheries, and they may refer to the actors and processes that link the processing,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seafood.

However, in the Spanish-Norwegian value chain for salted fish production and trade, operators performing a variety of functions operate each production station. Most of these functions are complementary,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actors collaborate. The rules and social practices (conventions) that apply to interactions and economic transactions in each localized production community thus govern their actions and transactions. The objective of either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or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ir interactions, or both, then determines the alternatives for the actions of each player in this production system. As a result, what players are able to do depends on their assessments of the transaction and on their options, their strengths, and competitive pressure. In fishing industries, resource dependence is an uncertain factor, leading to risks of miscalculation and possible threats to investments (cf. Porter, 1990; Reiffenstein, Hayter, & Edgington, 2002; Trondsen, 2011; Williamson, 1981).

One way of controlling for insecurity is to establish institutions that work to secure the

interests of firms under volatile competitive conditions (Cornish, 1997). Such strategic adaptation can range from direct establishments, which are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end market, to the internalization of sales functions within a company, whereby some employees work with sales contracts and market intelligence. However, because most Norwegian fish producers are part of international value chains, firms without specific sales and intelligence functions also depend on their relations with exporters.

### III. The Norwegian salted fish industry in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alue chain may influence its governance. Norwegians produce salted fish, which is a seafood product for which at least the first stages of production are standardized and generic in character (Lindkvist et al., 2008). The generic aspect of this produc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mon values and ease of recognition in the market. Standardization occurs when production has taken place with a well-known and widely used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where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is relatively easy to maintain. Competition between manufacturers therefore must occur through the price mechanism (Storper, 1997: 109).

The Norwegian-Spanish chain of salted fish and seafood has previously been characterized as fragmented (Lindkvist & Sanchez, 2008; Lindkvist, 2010). Resource acquisition in this industry rests with the fishers who own the right to the fish resources. In 2009, processing salted fish was undertaken by 130 fish producers in Norway. These producers included many small individual and independent actors as well as several major companies operating bases in key fishing towns along the Norwegian coast.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Norwegian part of the value chain entails a lack of mutual control over other parties in the chain. Fish producers do not control the fishers and vice versa. When products cross national borders, the value chain is also characterized by a lack of Norwegian representatives abroad. Very few Norwegian producers have established missions in the nearly 60 international salted fish markets. Norwegian fish is promoted through Seafood Norway, the semi-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for the export of fish products. Several independent mediators convey products from producers to buyers, or pass buyers' requirements back to manufacturers. Norwegian producers therefore rely on the contacts that are possible to establish in a fragmented chain (this fragmentation makes long-term contracts difficult). In this situation, which invites the Norwegian industry to move towards market governance (Gereffi et al., 2005), price signals from the market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markets served. When the market exercises control through standardization and transparent price signals, the cost of changing market relations is small (Gereffi et al., 2005). Thus, deep market integration is not a prerequisite for producers. This type of market governance seems to be preferred by Norwegians. It gives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rely on their good resource situations and the freedom to switch between markets that promise the best price.